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作者：郭永玉

第一轮

两位专家共同意见回复

修改一：关于如何将弗洛姆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相联系？

两位专家都指出应该将弗洛姆的理论 with 当今社会现实包括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将弗洛姆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相联系，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要有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又要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立住脚，所以要避免由作者自己空发议论，全部论述都有中文文献依据。

以下为此次修改增加的内容：

关于威权主义：

在当今，以实行超级总统制的俄罗斯为例，总统地位居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之手（许华, 2014; 邱芝, 范建中, 2009）。在俄罗斯联邦成立早期，国家处于混乱之际，手腕强硬的普京登上历史舞台。2000 年上台后，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强垂直权力体系和中央权力地位（范建中, 2005）。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危济得以缓解，实现了社会稳定，恢复了民众对国家的信任。遗憾的是，历经了十多年的演变，俄罗斯威权政体的弊端逐渐放大，越来越倚重个人集权，这对于民主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造成了伤害。加之官僚主义的盛行、腐败的滋生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引发了新的政治不稳定，俄罗斯的威权政体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吴大辉, 2012; 岳非平, 2016）。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官本位或权力本位之上（俞可平, 2013）。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传统，使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许开轶, 2014; 何增科, 2004）。权威治理体制在转型期间发挥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新威权主义也是近 40 年来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究竟能否成功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也一直受到质疑（马立诚, 2015, pp.11-15）。要避免陷入类似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困局，应当促使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实现权力的祛魅，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去发挥政治权威的作用（陈昌升, 2007; 俞可平, 2016）。

关于民族主义：

从国际上来看，当今世界上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可称作“单一民族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王志立, 2013）。因此，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尤其是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全球性的问题，对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建构和稳定，对外影响着同他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里主要谈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其对国家内部的影响而言，以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民族主义被苏格兰民族党利用，结合了民粹主义话语，描述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存在的多维度差异，为苏格兰独立提供了合理性，助推了苏格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

绪。导致英国陷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泥淖（胡莉, 2020）。就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言，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为例，其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技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增加了全球治理改革与转型的难度（王瑞平, 2018）。就中国现实而言，作为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反蒙昧宗教主义、专制主义、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严庆, 平维彬, 2018）。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马立诚, 2015, p.155）。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表现为官方和民间的结合，政治意识和消费文化的统一（李红梅, 2016），出现了激烈的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言论。相较于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带来的一时痛快，其消极后果将会是长远的。对外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中国威胁论”，并且很可能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王延中, 2017）。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战泓玮, 魏宝涛, 2021; 钟海帆, 2015）。

关于消费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活方式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张文富, 2012），

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消费主义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拉动了消费、扩大了市场，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值得警惕，有学者认为，消费主义在中国具有三种危害，分别是：（1）作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导致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鲍金, 2013; 张文富, 2011）；（2）形成大量浪费的消费模式，给生态环境造成沉重负担（赵玲, 高品, 2018; 刘敏, 2011）；（3）过度崇尚消费自由，构建一个消费自由的乌托邦，成为所谓“阶级平等”的保护色（余保刚, 2016; Marcuse, 1964/2008）。从现实来看，大量的年轻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寻求价值的实现（林江, 李梦晗, 2021）。令人感到忧虑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为消费主义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吴义周, 2017）。商家通过无形的网络监控为不同消费群体量身定制的商品营销广告铺天盖地而来（蔡昉, 2019; Zuboff, 2019），大量年轻人抵抗不住诱惑被怂恿去购买商品，用无止境的消费来满足自尊的需要、身份的认同，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修改二：关于弗洛姆理论与当代实证研究的关系

两位专家都提出，文中引用的当代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与弗洛姆的理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文中交待不够。此次修改更具体地交待了所引用的实证研究与弗洛姆理论的关系：

如对于威胁与威权主义，弗洛姆（Fromm, 1941）曾提出经典假设，即在威胁的情况下，以威权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Manzi 等人（2017）的研究从这一假设出发，整合了先前的研究者对该假设的研究证据，以洞察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他们在研究中首先测量了参与者的家长自主支持水平，接着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对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威胁进行操纵，并进行了操纵检验，最后测量了参与者的威权主义。结果发现，报告了较低水平来自父母对自身自主性支持的参与者在感知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威胁时，会倾向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即倾向于支持权威、维护权威，而报告了较高水平家长自主支持的参与者往往不会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社会威胁。这一研究结果为父母育儿方式在塑造个体面临社会威胁时的反应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的经典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即这一结论支持了弗洛姆（Fromm,

1941) 的观点: 以威权化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 现代的研究者通过其研究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弗洛姆 (Fromm, 1936) 曾提出: “权威是一种假性安全, 可以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缓冲作用, Decker 等人 (2013) 的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 结合定性社会科学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 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德国社会中潜在的用以抵御繁荣消失后的疼痛的威权主义倾向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 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的凝聚作用丧失, 右翼极端主义态度在社会中凸显。又比如弗洛姆 (Fromm, 1941) 曾将右翼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心理—政治机制, 人们可以借助它来弥补对周围环境失去的个人控制, 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Manzi 等人 (2015) 在此基础上, 于意大利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验证此观点, 他们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操纵参与者的社会威胁感知, 而后测量他们的控制感和威权主义。结果发现, 遭遇了外部安全威胁的人体验到更低的控制感, 继而促使他们去信奉权威、崇拜权力。这一研究再次验证了弗洛姆 (Fromm, 1941) 关于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观点的同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 证明了控制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以及生活意义感的调节作用。更大样本规模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 Roccato 等人 (2014) 利用 38 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 (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 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 (如种族、政治与道德上的不宽容)。Miller (2017)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 WVS) 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 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 经济发展状况糟糕 (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 的国家的公民更可能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 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

如 Cichocka 和 Cislak (2020) 引用了弗洛姆 (Fromm, 1973) 关于集体自恋的观点, 即集体自恋是创造一种理想化的群体, 旨在弥补个人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内群体关系三方面, 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在政治方面, 集体自恋与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支持有关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集体自恋者甚至愿意支持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伤害他们内部团体的政策; 在群际关系方面, 集体自恋与外群体威胁的夸大感知, 以及对此做出敌对反应的倾向有关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3), 这可能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增加, 从而解释对外群体阴谋论的信奉 (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在内群体关系方面, 集体自恋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积极形象 (Whitehouse, 2018), 他们往往会高估内群体成员的英雄事迹以及内群体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贡献 (Putnam et al., 2018)。该文通过回顾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证明源于弗洛姆的集体自恋在理解当前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的启发作用, 即集体自恋是补偿性的, 既不服务于外群体成员, 也不服务于内群体成员。相反, 集体通过提供一种基于群体的自我提高策略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 (Cichocka & Cislak, 2020)。

Ward 等人 (2012) 为了解媒体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对食品系统的信任, 以及管理营养冲突信息所采取的策略。通过对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 44 户家庭的主要负责采购食物的家庭成员进行了 44 次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 为了推销而对食物提供多种信息会破坏人们对其原本的认识, 并可能导致有害健康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不断被信息轰炸, 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 只好听从广告的推荐。这一研究结果与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不谋而合。

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后果之一便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Bauer et al., 2012; Tsang et al., 2014）。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Saunders 和 Munro (2000) 开发了 *Saunders Consumer Orientation Instrument* (简称 SCOI) 用以测量弗洛姆 (Fromm, 1955) 所提出的市场倾向的性格，研究发现，SCOI 水平越高的人，其物质主义水平就越高，同时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抑郁。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与消费能力挂钩，自尊就变得商品化。Isaksen 和 Roper (2012) 对英国的约 100 名青少年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揭示他们对于消费的态度和感受，尤其是对于时尚的消费。结果发现，在这些青少年群体中，自尊已经被商品化，未能跟上消费趋势的个体就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排斥、来自同伴的负面评价和更低水平的自尊。该研究虽未直接提及弗洛姆的理论对其影响，但其研究结果恰恰能够证明消费主义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与弗洛姆关于市场性格的理论相一致。

修改三：删减、精炼、压缩文字

两位专家都建议要精炼文字，适当删除。删减文字既是修改原文本身的需要，又是增加以上文字以后如何使文章限定在一定篇幅的需要。以下是本次删除的文字：

现代人的不安全感部分：

他很少远离家乡，他总是隶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但使他感到安全。人似乎是受自我利益所驱使，可事实上他的整个自我已成了他亲手制造的机器的工具。人们沉溺于自己是世界的中枢这一幻觉之中，但仍被一种强烈的无意义和无能为力的感受所笼罩。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打击对方

工厂主对生产过程和产品本身毫无兴趣，生产只是为了赢利，什么有利可图，他就投资生产什么。

认为情况更加糟糕，也是他作为心理学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他

这里所说的人格不是指道德或尊严方面的含义，而是指一些人格特征。

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不是由其生活的逻辑决定，而是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

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价值做出判断，就必须看自己在市场上是否获得成功，看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如何，离开了这些，就无法确证自己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强大的社会或他人的认可。作为个体，他是渺小的、孤独的、不安全的。

手中的权力既强大又神秘，他们统治着整个社会，

来说，个人的勇气、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得以成功发挥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已荡然无存。他们

但他们的境况大不同于以往的中小独立商。尽管

，他必须与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旦落后了，就会被无情地解雇，所以他也没有安全感与之相比，他显得极其渺小可怜。他没有独立性可言。

企业实在太大了，每个人只能了解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的一个很小的领域，不可能把握整个企业的面貌。

威权主义部分：

因此，为了深入讨论威权主义性格，有必要先澄清一下“权威 (authority)”这一概念。

这样，他就不必去做自己的事，或者说，主人的事、组织的事、集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只管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了。

成为他人的上帝，把他人视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一言以蔽之，通过对其他生命的虐待来得到快乐。
施虐者之依赖其虐待对象的迫切性，不亚于受虐者之依赖能虐待他的对象。

消费主义部分：

现代市场则是一台以抽象、与个人需要无关为主要特征的机器。生产者是为市场而不是为所熟悉的主顾而生产。生产的多少完全建立在供求规律的基础上，完全取决于产品能否卖得出去，以及可卖到什么价格。但生产者面对市场也是茫然的，他无法确实地知道市场是否需要他的产品，即使他保证产品的质量。

比如，营业员应该用诚实、可靠、负责这些特质来打动顾客，于是他就表现这些特质，至于他是否真的诚实，无关紧要，也没有人去关心，他自己也不关心，他只关心“诚实”能在市场上给他带来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包括自己都变成“我”的占有物。我之所以占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有可能随意支配它们。可是，反过来说关系也是这样，物也占有我，也支配着我。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关系，而是使主体和对象都成为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气沉沉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弗洛姆的未来方案部分：

生产性是人运用他的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的潜能的能力。生产性的人体验到自己是其力量的体现者和行动者，是自主的而不是受任何外在力量支配的。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

本篇是理论文章，结构、逻辑都顺畅，并且有文采。评审意见比较难写，不知道是就文章谈文章，还是也对文章的立意、大义发表评论——按理这属于学术讨论。目前且不作区别，总结起来谈以下几点，也可认为是读后感。

1. 启蒙是本篇的主旨，通过总结弗洛姆对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批判来体现弗洛姆思想的启蒙价值。所谓启蒙，也就是**针砭时弊、社会批判**。故应该对当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有针对性**。就是说，“文章合为时而作”。作者也有这个意识，但总的印象是，这个目标完成得不够到位。写出了弗洛姆对这三个主义的批判，**不够的是这种批判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所以读文章更多的感受是一种“重温”，较少“警醒”。我想这恰恰是作者不希望的。

回复：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一说明**。

2. 在文章的创新性上（自查报告的内容），我个人倒是有兴趣看**弗洛姆的思想如何影响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又是如何支持了弗洛姆的思想的**。这个部分的内容较为简略。

回复：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二说明**。

3. 文章从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出发，这当然是精神分析式的思考，但感觉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文化的**结合处不那么清晰**。美国上世纪 50-60 年代的情形与中国当下的情况，这两种社会条件是否可以比较？是否可以作为重温弗洛姆思想的现实社会条件呢？美国的情

形与当下中国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之处，弗洛姆思想对当下中国的特别意义和价值究竟如何？

回复：专家所言极是。根据弗洛姆的论述，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下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条件方面有共同之处，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中小资产阶级的壮大。同时，具体与德国的相似之处还有，强调整体和服从，在国际关系中属于后发大国，有后来居上之势等等；具体与美国的相似之处还有，贫富差距大，鼓励成功，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等等。当然，中国与德国和美国在社会特征上又有极大的不同，特别是政治体制上，本文作者难以胜任回答此问题的任务。弗洛姆确实极少论及中国。之所以认为弗洛姆的理论在中国仍有现实意义，是因为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而消费主义则是 20 世纪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高度发展以后的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无论从弗洛姆的论述中、其他学者的论述中，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都能感知到这一点。但限于本文的主旨、篇幅以及作者的知识结构，在文章内容上没有能论及当今中国与德国、美国在社会条件上的相同和不同。

4. 从学术继承来说，不清楚从思想层面（不是对实证研究的影响或者实证研究对其论述的支持等），**弗洛姆思想有没有后续发展，或者有其他人在发展他的思想？**我会觉得文章的主体内容试图在弗洛姆本人的论述中发掘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蒙价值。这固然重要。但单就学术发展而言，**有多少人在研究弗洛姆的思想，他的后继者如何，相关的学术团体活动如何，**我会觉得这些时能够说明弗洛姆思想对现代学人（应当承认，我对这块很不熟悉，所以不知道究竟如何）影响的直接证据。如果没有很多人关注，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全球化或全球化倒退呢？威权主义盛行呢？还是某种社会机制（例如，学术评价机制）让人遗忘了他。当然，限于文章的主旨，作者也可以选择性地不处理这个方面。

回复：关于弗洛姆在当今学术界的影响力，在文章的第 6 部分“6 弗洛姆的启蒙思想与 21 世纪”有专门介绍，此次修改增加了如下内容：

国际弗洛姆学会自 1985 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宗教等领域推进对弗洛姆思想的学术研究，官方出版物是年鉴 [Fromm Forum](#)，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1990 年至今已经出版了 31 期，主要刊发研究弗洛姆学术思想的文章。自 1987 年起，该学会组织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相继出版了研究弗洛姆在教育、宗教与伦理、社会、精神分析方面学术思想的专著 13 本。此外，该学会不定期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国际弗洛姆研讨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自 1995 年起，该学会每年颁发 the [Erich Fromm Prize](#)，用以表彰那些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维护或复兴弗洛姆传统中的人文思想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曾获奖者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学者，如著名哲学家 [Noam Chomsky](#)，也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如德国前内政部长 [Gerhart Baum](#)。该学会还在德国图宾根市建立了弗洛姆研究所（[the Erich Fromm Institute Tuebingen, EFIT](#)），用以存放和管理弗洛姆文献遗产以及学会的出版物。2016 年 12 月 13 日，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的弗洛姆研究中心成立。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会促进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文前述相关研究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都是弗洛姆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

5. 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对弗洛姆只有阐扬，没有批判！弗氏启蒙——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成效？“道不行”，是道的原因，还是时、势的原因？

回复：的确没有集中篇幅去批判，但在经济观点上是有批判的：

弗洛姆主张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表明，计划经济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结合社会变革来加以弥补，但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弗洛姆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设想缺乏总体上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一个不懂经济学又抱有从总体上改造社会之理想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局限是必然的。

从理论上批判弗洛姆是另一个专门的任务，本文作者在有关论著中有专门章节论述，但限于本文的主题，未能集中论述弗洛姆的局限。

至于弗氏启蒙的效果，应该放在人类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看待。弗洛姆是许多启蒙思想家之一，西方启蒙运动至今三百多年了，中国启蒙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启蒙的任务虽然没有彻底完成，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但毕竟有了明显的进步，如大规模战争明显减少了，冷战结束了，人权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在增强，等等。弗洛姆晚年热心于通过电台等媒体面向大众发表演讲，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他的著作也因其写作风格而持续畅销，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他的影响和效果。

您这个问题涉及对启蒙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正如本文结尾处所言：

依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未成年蒙昧状态。因为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简直是太安逸了！启蒙则意味着要敢于认识，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并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进而将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Kant, 1784/2014; Gay, 1995/2019, pp.13-14)。这就意味着，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启蒙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Burns, 2013/2019, p.9)。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一方面自我的成长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也要永无止境地克服人性中倒退的力量。人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充分个体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要退回到童年甚至婴儿。只要这种矛盾存在着，启蒙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弗洛姆的理论也就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继续给人们以启示。

6. 文章写作上，文字可以精炼一些。例如阐述弗洛姆的思想，行文不够简练。有些段落可以大幅压缩。

回复：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三说明**。

7. 回头重说重点，建议文章考虑把立意放在“弗洛姆思想的当代启蒙价值”上，要加强说“当代”，以及“启蒙”——不是没说，是说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刻，不够发人警醒。

回复：完全接受此意见，因此意见与以上第一条意见可以合起来考虑，故**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一说明**。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弗洛姆是 20 世纪伟大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既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又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成员，同时还是宽泛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的主要论著已大都译成中文，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在中国心理学界能享有如此高规格待遇的，或许只有弗洛伊德能与之比肩）。弗洛姆对西方病态社会及病态人格的剖析和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对新的社会制度、“新人”的描绘与渴求更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一文从宏观上深入探讨了弗洛姆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条分缕析、旁征博引、视野开阔、思维深邃，是一篇很有学术份量和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文章。有如下几点意见和建议供作者参考：

1. 作者通过弗洛姆对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将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的精髓提炼概括为这三个极具鲜明时代特征的主题或向度，有很大的创新与突破，本文不是平铺直叙地阐释弗洛姆的思想观点，而是以“启蒙”为轴，将其众多论著的主旨加以归纳整合。且这种分类整合竟无任何违和之感，实属难能可贵，这在国内外学界尚无先例，很有新意和启示价值）的分析来论述其理论的启蒙价值，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三种现象或者三个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各自与启蒙价值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回复：专家此条意见极为重要，文章的第6部分“6 弗洛姆的启蒙思想与21世纪”之第一段论述，可视为对此问题的回复：

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基于理论逻辑的，不如说是基于实际生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者对于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自己理性地回应当今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警觉。从理论逻辑上的确难以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心理机制上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以消极的、逃避的即退行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不安全感的现实处境。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民族主义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长，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安全感的途径。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也就是致力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这是一条前行的不归路，而不是朝向传统等级社会、朝向母亲及其象征物、朝向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的方向退行。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积极与消极，前行与退行，都应该被置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框架下加以理解，即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成长，不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反而固着在或退行到口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极端的退行不仅是退行到童年，而且要退行到母亲的子宫（当然是心理上的、象征性的）以克服不安全感。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将其运用于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将传统等级社会、母亲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行方向的目标。

2. 诚如作者所言，弗洛姆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方式来缓解甚至消除消极情感的心理机制及其后果，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证据。毋庸讳言，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之所以被视为非主流的心理学家（非自然科学取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大多为思辨性、主观臆断性的（缺少可重复验证性和简约性），很少能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但随着有关缄默知识、内隐认知的深入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科学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可和肯定；随着对出生顺序、早期记忆等对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实证探讨，阿德勒的学术地位得以提升。作者在论述中除了引用弗洛姆及有关理论探讨的文献，还引用了十余篇当代的文献，似乎这些文献可以支持弗洛姆的理论或证明弗洛姆在当代的影响力。但这些文献的背景在文中缺乏交待，难以使读者清楚地了解这些文献与弗洛姆的理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希望作者适当压缩和精炼已有内容和篇幅，进一步挖掘和呈现这些实证性文献，以展现和证明弗洛姆理论的现当代价值蕴涵。

回复：专家意见极是。关于弗洛姆理论与当代实证研究的关系，此次修改更具体地交待了所引用的实证研究与弗洛姆理论的关系，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二说明**。

关于压缩和精炼已有内容和篇幅，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三说明](#)。

3. 弗洛姆作为马克思、弗洛伊德忠实的粉丝和拥趸，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对西方病态社会、病态人格抽丝剥茧般反叛的理论视域和观点，并试图将二人的思想予以整合（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是从宏观、群体、阶级分析的视角鞭笞西方病态社会的，而弗洛伊德是从微观、个体、心理分析的层面揭露西方病态人格特征的），尽管这种尝试不太成功但也自成体系。弗洛姆作为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对西方社会人性堕落、人情淡漠、人际疏远以及“异化、物化、奴化”等现象与成因的辨析与鞭挞并不在少处且理应有所涉猎，特别是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可适当有所关照与引证。同时，作者在介绍弗洛姆的观点时使用了较多的转述，有的地方整段没有文献注释，这种写法与当今的学术规范有一定距离，需要补上一些文献注释。

回复：弗洛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在本文涉及到“异化”问题，但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仅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探讨哲学概念。如文章第一部分的有关论述：

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Fromm, 1941/1987, p.159）。社会的经济体系，从其运用科学技术方面来看，是越来越合理化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用越来越不合理。经济危机、失业和战争决定着人的命运。

白领工人的人数随着企业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但他从事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但他不能控制这台机器。

个人面临着一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相比之下，他只是一粒微尘罢了（Fromm, 1941/1987, p.176）。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一个受命行军的士兵或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机械地行动。纵然他还能行动，但他并不感到自己是有个性、有意义的。

另外，本次修改已经补充了一些文献注释，见文中蓝色文献注释。

4.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题为“弗洛姆的启蒙思想与 21 世纪”，立论新颖、直抵时弊，但尚存意犹未尽、点到为止之感。似可借助弗洛姆“给后人磨制的镜片”看清疫情和后疫情时代西方社会的乱象和部分政客的丑恶嘴脸，以进一步提升论文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比如说：特朗普高喊白人至上、美国优先、疯狂退群、四处树敌；拜登上台伊始，重振西方同盟、联合围堵中国、疯狂炫耀武力；刚刚结束的中美高层对话，美方代表居高临下、长臂管辖、肆意诋毁中国；经济呈衰退之势时西方极右势力蠢蠢欲动、招摇惑众、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种族仇视、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屡禁不止；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压抑、空虚、无助、孤独、焦虑、愤怒、抑郁，信奉物质主义、超前消费、娱乐至上，凡此种种，无不证明弗洛姆有关维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当下正在死灰复燃、阴魂不散、愈演愈烈）的深刻辨析与全力反动不仅没有过时，且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启蒙”任重道远、正在路上！

回复：专家此条意见非常重要，是此次修改的重点，已经补充了几段论述，见以上[共同意见回复](#)，[修改一说明](#)。

第二轮

专家 1 意见：

就文章本身来说，结构、写作都不错。唯一一点是文字可能还可以精炼压缩一些，有些叙述显得太铺陈。可能部分原因是弗罗姆本人就是一个大众作家且文风铺陈。本文作者需要考虑学报的读者群。

回复：完全同意专家意见。此次进一步压缩了文字，使表述尽可能精炼。一共删除 1 千多字，以下为删除的文字：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子与奴才、贵族与平民、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人一生下来就确定了，很难也很少改变。

社会的经济体系，从其运用科学技术方面来看，是越来越合理化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用越来越不合理。经济危机、失业和战争决定着人的命运。

工作也仅仅是手段，而不是人的生命潜能的展现。

现在时兴“热情开朗”，所以我也应给人以热情开朗的印象，否则我就很可能被淘汰。

这就是现代人所生活的总体画面：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震耳欲聋的无线电广播；节奏强烈的爵士音乐；一日三变的新闻报道，搞不清哪一种是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演出，那些失去个性的女演员像小巧玲珑的机器一样运转着，动作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地表明，个人面临着一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相比之下，他只是一粒微尘罢了（Fromm, 1941/1987, p. 176）。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一个受命行军的士兵或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机械地行动。纵然他还能行动，但他并不感到自己是有个性、有意义的。

似乎这样就可以克服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之感：我本来渺小无能，经常犯错误，除非依靠外力的帮助，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所以全靠上帝、皇上、领导……因此，就施虐性格的人，总想去统治或伤害他人，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不奇怪。追求权力似乎是人的本性，是天经地义的。但受虐倾向看上去就与这一本性相矛盾，人为什么会轻视自己以致伤害自己并能从中得到快乐呢？第一个力图彻底解释受虐问题的心理学家是弗洛伊德。他一开始只从性本能的角度来解释肉体上的受虐现象，后来他认为精神上的受虐问题意义更大。他，伤害、奴役他人，使其痛苦不堪很明显，渴望依赖他人和渴望蒙难的倾向，与渴望统治他人并使他人受难的倾向是不同的，是他人和社会能够接受的只要手头有钱，就去把它花掉。现代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在这个充满商品的“天堂”里逛来逛去，对各种商品垂涎三尺。很多时候消费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时尚潮流的需要。因为广告照片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所以我们也喝上一瓶。实际上我们是在喝那幅照片，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在喝美国的习惯（Fromm, 1955/1988, p. 134）。

每个人的梦想都是能买到最新推出的东西，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式样的商品。

要说有，也只是一连串消费活动的回忆：这个风景点我到过，正如那种牌子的饮料我喝过一样，两者对心理的影响没有什么区别。

弗洛姆特别提出有保证的最低收入是维持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物质保障。

专家 2 意见：

作者在认真揣摩吸取审稿专家意见并引介吸纳大量权威新近文献支持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完善。修改版所添内容及所删减的第一版部分冗长文字，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现实意义更为凸显、理论高度愈发提升，较之初版有了质的飞跃。

第三轮

编委专家意见与回复:

正如两位外审专家所言,该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作者也作了较好的修改与回应。经两轮修改后,论文质量有较大的提升,但仍有一些问题跟作者商讨:

1.一些译词还需核查,尽量保持同行认同一致性:比如:1)标题: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一直被译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而这里使用了“人本精神分析”,作者是有其他考虑?

回应: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完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译为“人本精神分析”主要是考虑到习惯上中文名词尽可能简洁,作为形容词的 Humanistic 翻译为“人本主义的”,简写为“人本的”一般不会引起歧义。类似的情况还有 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 完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但也有译为“存在精神分析”。(参见:孙平、郭本禹著《从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鲁特凯维奇著,吴谷鹰译《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存在精神分析评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为确保基本概念的完整准确性,同意修改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2) Authoritarianism 一词有翻译为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作者在本文中译为“威权主义”,而参考文献同行译为“权威主义”([邱芝,范建中.(2009).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1),7-12+95])。

回应: Authoritarianism 一词可翻译为“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查知网:“权威主义”找到 8459 条结果,“威权主义”找到 7598 条结果。

由于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学名词,近年来译为威权主义越来越成为两岸中文学术界的共识,尽管本文作者过去一直译为“权威主义”,近年来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改为“威权主义”。主要是遵循学界习惯,仍然不能说何者为对何者为错。当然也可以有所辨析,

可参考季乃礼,张振华.(2011).心理层面的威权主义辨析.比较政治学研究, 2, 50-63. 一文:

“Authoritarianism”的译法 有关“Authoritarianism”,国内有三种译法:“权威主义”(李琰,郭永玉,2007)、“威权主义”(夏立安,2000)、“权力主义”(阿多诺等,2002)。那么,这三种译法究竟哪一种比较合适?“Authoritarianism”一词从“Authoritarian”延伸而来。美国学术界曾经区分了三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Permissive、Authoritarian 和 Authoritative。其中 Permissive 指对子女溺爱,不加教育,任由子女的天性自由发展,可将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翻译为“溺爱的”,Authoritarian 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指不顾及子女特点,完全让子女依靠家长意愿行事,让子女处处依赖父母。Authoritative 处于两者之间,指对子女的天性因势利导,既注意孩子的个性,注重自我独立性的培养;同时又强调父母权威,以及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的指导作用。由此看来,在西方的观念中,Authoritative 是一个积极、肯定的词,很难有一个准确的中文词与之相对应,可勉强译为“权威的”。Authoritarian 则是一个消极、否定的词,是贬义词。在中国,“权威”、“权力”皆是中性词,而“威权”是贬义词,翻译为“威权的”比较合适。“Authoritarianism”作为一种消极、否定的思想、观念,应翻译为“威权主义”,相反将其翻译成“权威主义”、“权力主义”是不合适的。

具体到本文来说,心理层面威权主义的产生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威权主义心理产生于家庭,源于父母严厉地对待子女。譬如,霍克海默就认为威权类型的人形成于早期家庭教育。《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也强调父母严厉地对待子女导致亲子间交流困难,无法体会到,无法感到安全,只有服从。总之,翻译成“威权主义”取“威权”是一个贬义词,

这种贬义来自于家庭中对亲子关系的考察，延伸到政治上的含义。因此，本文赞同将“Authoritarianism”翻译成“威权主义”。

其他参考文献：

包刚升. (2015). 政治学通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27–154. 第 5 讲 不同的政体：民主、威权与极权，将 authoritarianism 译为威权主义，将 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意味着政治学教科书的通行译法。

夏立安. (2000). 民众主义、威权主义、社团主义、民族主义. 拉丁美洲研究, 5, 60–62.

马得勇，陆屹洲. (2019).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4)3, 180–193.

李艳霞. (2015). 何种治理能够提升政治信任：以当代中国公众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7, 59–65. 涉及集体主义价值观、威权主义价值观等。

文献还可以列很多，以上几位作者分别就职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政治学相关院系，具有代表性。

2.正文有些表述还请再斟酌，比如： 1) “5.弗洛姆的未来方案”，一看标题让人摸不着头绪，实则讲的是社会改革方案； 2) “弗洛姆的启蒙思想与 21 世纪”，小概念与大概概念的套用，好比说“我与 21 世纪”，对弗老有过誉之嫌。

回复：同意专家意见，“弗洛姆的未来方案”改为：“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弗洛姆的启蒙思想与 21 世纪”改为：“弗洛姆启蒙思想的当代意义”。

3.正文论文的逻辑结构线索提示不是很明显。比如： 1) 正文中的“2 威权主义”“3 民族主义”“4 消费主义”，都是基于“1 不安全感”而展开，把 2、3、4 与 1 并列序列，是否妥当？ 2) 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线索提示不明显，比如“2.威权主义”，洋洋洒洒近 5 千字，虽然细讲能作者论述逻辑关系，但没有明显的逻辑提示信息，让人读起来很压抑。建议适当增加**逻辑线索提示句、词或序号**。

回复：非常感谢专家意见！修改稿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部分合并为：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大幅压缩了这部分的篇幅，这样全文就分为四部分，突出了最后两部分的重要性，也使得文章逻辑线索更清晰了。

4.全文字数（包括参考文献，不包括英文摘要）超过 2.6 万，极大超过学报的篇幅限制，建议压缩到 1.6 万以内为佳。个人感觉本文的主要贡献在 5.6 两部分，而 1、2、3、4 只是对弗洛姆相关理论的归纳总结，无太大创新之处（大量引用的是弗的原著内容），可以大幅精简。

回复：赞同专家意见，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部分合并为一部分后，大幅压缩了篇幅。

此次删除的文字如下（删去近 3 千字）：

威权主义部分：

不由自主地轻视自己、贬损自己，甚至伤害自己和折磨自己，成天进行自我谴责和自我批评。受虐倾向本身是非理性的，但常常以“合理”的形式出现。这样的人把受虐式的依赖说成是爱和忠诚，把自卑感说成是恰到好处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把种种不幸说成是由不可改变的环境造成的。

对他人拥有绝对的无限的统治权，剥削、利用、蚕食他人，敲骨吸髓，以至寻找机会去羞辱他人、伤害他人，使他人处于困窘、痛苦的境地施虐和受虐一样，都是为了避免孤独和分离而依赖他人。施虐者一旦要失去受虐者，就会感到软弱无力。他往往通过物质刺激、轻易

许诺、自我炫耀、假惺惺地关心以及其他笼络人心的办法来控制他人。他可以提供一切，但有一样东西必须除外，这就是：自由和独立的权利（right）。

施虐倾向一般来说比受虐倾向的力量更强，在为自己的行为制造理由时更加合理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这种性格的人常常表现出对他人异乎寻常的关心和爱护。正如受虐倾向常常表现出敬爱，施虐倾向则常常表现出慈爱。但施虐倾向也会表现为攻击的形式。攻击的施虐带有更明显的残酷性：这种人喜欢亲眼看到自己带给他人的痛苦，即自己直接造成他人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并从中得到快乐。这种形式的施虐往往凭借着某种不可置疑的理由以便肆无忌惮地行动，实际上是使弱势的一方感到恐惧从而使其更加依赖自己的权势。

弗洛伊德发现施虐和受虐虽是对立的两极，但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于是他认为人有一种死本能，这种本能既可以指向他人又可以指向自己。如果指向他人就表现为施虐、攻击、破坏，如果指向自己就表现为受虐。而死本能又是和性本能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死本能一般可以消融于性本能之中。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消融，性本能受到压抑，人就被迫在施虐（对他人）和受虐（对自己）之间做出选择（Fromm, 1941/1987, p.198）。施虐和受虐都是性变态的类别。

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总是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之中，但这种感受通常是潜意识的，往往被自以为高明和了不起的表现所补偿，所掩盖。施虐倾向的本质是：绝对地控制他人，使他人服从我的意志，使自己成为他人的统治者。使他人痛苦的原因在于：再也没有比使人痛苦更能显示出对他人的统治权了。受虐者觉得以渺小的自我来面对一个强大的人，去依附于他，屈从于他，哪怕受苦，也比孤单一人要强。在受虐倾向中，与自贱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的势力的一部分，跻身并参与到这一势力之中。这种外在的势力可能是一个人、一种机构、一个国家或上帝等等。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魅力，可以永世长存。自己既然已被接纳进这种势力之中，也就分享了它（他）的力量和荣耀。

可见受虐与施虐虽然表面上是互相冲突的，但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和基础。

受虐倾向的人和施虐倾向的人不仅相互依赖，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共同依赖权力、崇拜权力。施虐者依赖受虐者，是因为离开了受虐者，他手中的权力就无处显示。受虐者依赖施虐者，是因为施虐者手中的权力能决定他的命运。他只有服从，才有望得到更多的好处。施虐倾向的人因手中握有权力而洋洋得意，受虐倾向的人则因得到有权者的关照而沾沾自喜。二者都热衷于追求权力，正是权力使他们得到暂时的安全感。

对这种人而言，手中无权是无能和卑贱的标志。一旦所仰慕的人大权旁落，就马上变崇拜为轻视。

民族主义部分：

母亲、土地、自然是人的根。人的成长，意味着脱离母亲的襁褓，脱离自然的限制。但失去母亲和自然的根基是令人不安的，人要找到新的“根”，才会感到安全。人最基本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不仅儿童，成年人也需要母爱。在充满挫折和变化无常的生活中，人多么渴望回到孩童时期以便得到母亲的保护！“俄狄浦斯情结”的实质在此。弗洛伊德只发现了现象，但他的泛性论解释歪曲了这一伟大发现。

弗洛姆受弗洛伊德的发展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的影响，认为这种人的心理发展受到童年创伤经验的固着，以致于成年后会不由自主地朝童年退行，退行到母亲的怀抱甚至子宫。历史上某些极端民族主义领袖表现出对地下工程的强烈热情，因为地下室意味着子宫，意味着绝对的安全感。基于这种理解，弗洛姆沿用了弗洛伊德的乱伦概念，在表明其心理机制的一致性的同时，又赋予其更为丰富的人性意义和社会历史的解释力。

自恋者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而过于关心自己，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世界和他人，表现为过高地评价自己或自己的占有物，而对他人和外在世界则评价过低，甚至视为自己的附属品。

或工具，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恋者最不能容忍批评，哪怕是客观的善意的忠告，也被视为恶意的攻击。如果有可能，特别是手中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会置批评者于死地。显然自恋超过了一定限度，就难以与他人合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但

毁灭与恨相联系，正如创造与爱相联系。创造需要付出努力，毁灭则意味着放弃努力，是受挫以后的反应，是人对不利于成长的处境的反应，是生命退化的表现。

它是人对挫折的反应。但这种反应

如果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你没有死，那你的功绩就大为逊色。如果你不幸成了战俘，那就是耻辱甚至罪恶，因为你没有死。

这里是弗洛姆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修正和发展。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生本能和死本能，二者相互独立，力量相当，前者倾向于爱和建设，后者倾向于恨和破坏。两种本能都是生命能量，都必须寻找实现的途径。如果死本能向外实现，就表现为攻击、破坏、暴力；如果不能或没有向外实现，就表现为自我虐待等心理疾病，自己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遭受痛苦，以便死本能这种能量得到释放。战争就是死本能向外释放的一种途径。弗洛姆也将毁灭视为人性的一种力量，但不是本能，而是在特定的生存状况下产生的。

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个人脱离家庭、氏族、民族的程度。它是从“群一致性 (herd conformity)”逐步向个体性发展的。所谓“群一致性”也就是和所在的群体保持一致，“herd”用在这里带有明显的贬义，原意一般指牛群。弗洛姆的用意是指每个人都和周围的缺乏个体性的人们保持一致，同时这样一种水平离动物较近而没有发展到成熟的人的水平。原始氏族的成员若要表达他的认同，可能就用“我就是我们”这样的表述，他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氏族中其他成员的“个体”。

消费主义部分：

购买成为一种强迫性行为，因而我们愈来愈依赖那些可以满足我们消费需求的人和机构。现代人似乎只对他买来的东西的新奇特征感兴趣，一旦出现更新的东西，就会喜新厌旧。相比之下，使用物品得到的真实享受却是次要的。

人们“消费”球赛、电影、电视、报刊、书、自然景色和社会集会，就像消费买来的商品一样。实际上他不是自由地享受“他的”闲暇，他对闲暇时间的消费是由工业决定的。娱乐也是一种工业，消费者被支使去买娱乐就像他被支使去买衣服鞋子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市场上流行与否，而不是从人的健康生活标准去衡量的。

市场倾向的性格不是基于个体特殊的潜能，而是基于市场的行情。行情随时会变，人的性格也要随时变化。这好像又进入了一种悖论：性格本来是人身上的一种稳定特质，在市场背景下需要的却是善变的行为，那么这种“稳定的”特质就是“不稳定”。这种性格的唯一永恒的特质是随机应变、见风使舵，随时准备迎合他人的期望，随时准备说“我就是你需要的！”

(Fromm, 1947/1988, p.82) 如果市场需要另一种特质，它随时准备被替换。市场倾向的前提是“空白 (emptiness)”，没有任何明确的、稳定的、具体的特质，因为任何这样的特质总有一天会同市场的要求相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心理机制问题虽然不是本文的贡献，而是弗洛姆理论的综述，但不讲清楚就不能论证启蒙的主题，要讲清楚又不能删减太多。此次删了3千字（正文仍有2.1万字），再删就很困难。可否请编委和主编酌情考虑？或者将篇幅问题留待最后定稿阶段裁定？非常感谢！

其它一些小问题：

1. 摘要：根据学报的要求，中文摘要字数请控制在200字以内。

回复：同意修改，已经处理。

2. 关键词：建议 3~5 个关键词。

回复：同意修改，已经处理。

3.参考文献的格式还需校对。比如，1）页码之间的连接符误用（稍长一点的）2）拼写错误：

Isaksen, K. J., & Roper, S. (2012).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elf-esteem: Branding and British teenagers. *Psychology & Marketing*, 29(3), 117-135.（British 这里多了一个空格）3）有些缺少期号：比如，McLaughlin, N. (2019). The coming triumph of the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lessons from the rise, fall and revival of Erich Fromm.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Studies*, 12, 9-22.

回复：同意修改，已经处理。

第四轮

主编意见：

意见 1：弗洛姆针对现实社会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于一体，试图改进现代社会中人的不安全感和交流感，使得人类更加关注终极存在价值，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尊严；不同的国家、民族、种族能够化解矛盾和冲突，更加和谐相处。这种基于哲学、心理学视角的分析和检视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际指导意义。论文经过多轮的修改和完善，逻辑线索比较清晰；评价和启示也比较客观和明确；论文篇幅基本合理。总体达到心理学报的发表水平。

建议：有些表达虽然流畅，但是，有些地方严谨度不够，有些口语化，需要请他人阅读和完善后发表。

回应：完全同意修改建议。主编标出的修改意见已经逐一处理。

意见 2：贵文因为涉及到一些政治性评论，比如俄罗斯政治治理，中国的新威权主义政治思潮等，请社科院一位专家帮把关看了看，专家意见是，部分论述观点有问题，说文中的政治性评论引用的文献中有好几个人的观点有问题，比如不建议引用马立诚等。心理学学者可能对于政治性问题的出版边界在哪里不太好把握。可否辛苦您修改一下，比如删减一些不是必要的政治性内容，尽量就心理学说心理学可好？

回应：完全同意社科院专家意见。修改稿删除了以下句子及文献：

在当今，以实行超级总统制的俄罗斯为例，总统地位居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之手（许华, 2014; 邱芝, 范建中, 2009）。在俄罗斯联邦成立早期，国家处于混乱之际，手腕强硬的普京登上历史舞台。2000 年上台后，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强垂直权力体系和中央权力地位（范建中, 2005）。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危济得以缓解，实现了社会稳定，恢复了民众对国家的信任。遗憾的是，历经了十多年的演变，俄罗斯威权政体的弊端逐渐放大，越来越倚重个人集权，这对于民主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造成了伤害。加之官僚主义的盛行、腐败的滋生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引发了新的政治不稳定，俄罗斯的威权政体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吴大辉, 2012; 岳非平, 2016）。

新威权主义也是近 40 年来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究

竟能否成功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也一直受到质疑（马立诚，2015，pp.11-15）。要避免陷入类似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困局，

但民族主义也会像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马立诚，2015，p.155）。

民族主义表现为官方和民间的结合，政治意识和消费文化的统一（李红梅，2016），

但考虑到第一轮退修时两位专家意见都要求联系现实，作者为此在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个主题下都补充了联系现实的内容，并主要引用了中文文献（谨慎起见），此次修改是**将这些内容完全删除还是尽可能有所保留**？现在笔者是既有删除又有保留。如果社科院专家建议完全删除涉及政治现实的内容，我也同意。不过这样就要重新考虑文章整体了，因为消费主义的中国内容部分并不涉及政治。如果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部分没有提到中国，消费主义部分也不宜提及中国。

第五轮

社科院专家意见：

统一回应：综合两位专家意见，本次完全删除如下三段正文和对应文献。

此次删除部分：

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官本位或权力本位之上（俞可平，2013）。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传统，使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许开轶，2014；何增科，2004）。权威治理体制在转型期间发挥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应当促使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实现权力的祛魅，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去发挥政治权威的作用（陈昌升，2007；俞可平，2016）。

从国际上来看，当今世界上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可称作“单一民族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王志立，2013）。因此，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尤其是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全球性的问题，对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建构和稳定，对外影响着同他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里主要谈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其对国家内部的影响而言，以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民族主义被苏格兰民族党利用，结合了民粹主义话语，描述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存在的多维度差异，为苏格兰独立提供了合理性，助推了苏格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英国陷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泥淖（胡莉，2020）。就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言，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为例，其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技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增加了全球治理改革与转型的难度（王瑞平，2018）。就中国现实而言，作为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反蒙昧宗教主义、专制主义、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严庆，平维彬，2018）。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不时出现激烈的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言论。相较于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带来的一时痛快，其消极后果将会是长远的。对外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紧张关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并且很可能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王延中, 2017）。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战泓玮, 魏宝涛, 2021; 钟海帆, 2015）。

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苏联建立了这种经济制度，但没有改变人被异化被奴役的处境，甚至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糟。新的经济制度的关键是解决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个人的主动合作之间的矛盾，使劳动真正成为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劳动者从被资本和官僚机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弗洛姆一方面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主张“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Fromm, 1981/1991, p.119）。这正是弗洛姆社会改革论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能实现劳动者成为经济活动的“积极和负责的参与者”正是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表明，计划经济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通过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结合社会变革来加以弥补，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弗洛姆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设想缺乏总体上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一个不懂经济学又抱有从总体上改造社会之理想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局限是必然的。

但我们还要看到他的一些具体设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在分配制度上，

审稿专家 3 修改意见与回应：

原文修改中对威权主义部分做了部分保留，如下：

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官本位或权力本位之上（俞可平，2013）。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传统，使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许开轶, 2014; 何增科, 2004）。权威治理体制在转型期间发挥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应当促使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实现权力的祛魅，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去发挥政治权威的作用（陈昌升, 2007; 俞可平, 2016）。

但保留部分（例如红色部分）容易引起歧义，实为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政治，**建议将所审部分涉及威权主义的内容全部删除。**

因为阅读全文，不知作者引述这部分内容的用意，故反馈意见供参考。

回应：同意专家意见，已完全删除此段正文和对应文献。

审稿专家 4 修改意见与回应：

“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官本位或权力本位之上（俞可平，2013）。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传统，使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许开轶，2014；何增科，2004）。权威治理体制在转型期间发挥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应当促使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实现权力的祛魅，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去发挥政治权威的作用（陈昌升，2007；俞可平，2016）。”

1、这一段话的逻辑有些不太清楚：“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是否在说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威权主义传统？如果是，那么后面的“从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在威权主义之前又增加了一个“全能主义”是一个很混乱的顺序；如果不是，那么“全能主义”指的应该是“皇权专制的传统”，“威权主义”则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过渡阶段，显然与之前说过的启蒙的目的相悖。

2、“中国自秦至清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是一个缺乏历史知识的论断，完全忽略了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与皇权之间的关系演变。

3、作者显然把中国至今为止的改革视为一个转型期，这个无可厚非，但把这个转型期的治理体制定义为“威权”体制，不但混同了改革以来各个阶段的差别，而且将目前为止的治理体制与“民主、法制、友善”对立，显然不太合适。

4、最为重要的一点，作者界定了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威权，但其实并未明确界定国家治理方面的威权，从个人心理和社会关系（受虐/施虐和服从权威）到国家治理体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持的巨大跳跃，把对个人心理的分析扩展到国家治理体制的类型，依靠的似乎是纯粹的信仰，表达的仅仅是个人的观点而非严谨学术分析。感觉作者在谈论威权体制的时候想的是希特勒式的一人疯狂导致人类灾难的例子，但即使是在法西斯国家，把治理体制上的问题归结为领袖的心理问题也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更不用说分析的对象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治理体系了。这个问题在关于民族主义的一节中也同样存在。

综合以上几点，**建议删除这一段。**

第 28 页

“弗洛姆主张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苏联建立了这种经济制度，但没有改变人被异化被奴役的处境，甚至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糟。新的经济制度的关键是解决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个人的主动合作之间的矛盾，使劳动真正成为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劳动者从被资本和官僚机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弗洛姆一方面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主张“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

（Fromm, 1981/1991, p.119）。这正是弗洛姆社会改革论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能实现劳动者成为经济活动的“积极和负责的参与者”正是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表明，计划经济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通过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结合社会变革来加以弥补，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弗洛姆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设想缺乏总体上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一个不懂经济学又抱有从总体上改造社会之理想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局限是必然的。”

1、从这一段来看，作者也不懂经济学，也不了解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是简单地重复社会上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误解。

2、关于苏联的说法多有和事实不符，弗洛姆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主张“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中只有一个方面是引用，有断章取义之嫌。

3、前面讲的是心理学，但是最后一部分又纳入了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似乎有些偏离主题（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综上，这一段也建议删除。

回应：同意专家意见，已完全删除涉及中国现实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段，及涉及计划经济的一段正文和对应文献。

第六轮

社科院专家意见：

这一稿作者综合各位审稿人的意见做出了修改，改得挺好，也挺不容易，尤其是既要求联系现实又不能跨越雷池。我觉得只有一段话的两个地方可能需要略微斟酌一下：

第 29 页：

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则是“最大的经济利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又具有巨大经济收益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Fromm, 1963/1986, p149-150）。

这段话里面，我不太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倒退”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知道作者的意思，但这个表达方式好像很别扭，不知道是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在用词的选择上有些困难。类似的，原则是“最大的经济利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又具有巨大经济收益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这种表达方式也有点儿别扭，如果能看到原文的上下文会好判断一些。

这两处不是特别紧要，只是供作者参考，可以由作者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理。

回应：引文来自：Fromm, E. (1986).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Pocke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弗洛姆, E. (1986).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张燕 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文：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

改为：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步的体制，而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体制。

原文：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则是“最大的经济利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

僚又具有巨大经济收益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Fromm, 1963/1986, p149–150）。

改为：因为这种社会的现实是，庞大的官僚机构掌控着国家的经济体系，相应的官僚集团获取着最大的经济收益，在这个体制中个人只能绝对服从。

主编意见：

“三者对于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自己理性地回应当今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警觉。”由于上文中关于中国“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文字都删除了，这里出现“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感觉比较突兀，据社科院专家意见，对中国的这个论断也颇具争议。建议作者再斟酌修改一下吧。另，“当今世界”的用法似不妥，建议改为比如“当今部分西方国家”。

回应：

原文：三者对于具有强烈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自己理性地回应当今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警觉。

改为：三者对于具有悠久传统文化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回应当今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崛起的警觉。

原文：“法国前内政部长 Gerhart Baum“，“法国”似是“德国”？

——**已改。**